



历史的启示

十年(1957—1966)建设史研究

陈雪薇

求实出版社

历史的启示

——十年(1957至1966)

建设史研究

陈 雪 薇

求实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对于1957至1966这十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作者在书中不是简单地叙述历史过程,而是运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对于这十年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自身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情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求实的评估;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失误,并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爆发的若干远因和近因。

责任编辑:冯世平 封面设计:张志明

历 史 的 启 示

——十年(1957至1966)

建设史研究

陈 雪 薇

*

求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下关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7.5印张 190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ISBN 7-80033-055-9/D·14

定价:2.00元

前 言

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从1957年起，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

1957年至196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创时期，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历史时期。这10年的历史，是党独立自主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取得正反两个方面丰富经验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开创社会主义大业的历史。研究这10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史，首先应当弄清楚它的历史特点。这10年的显著特点是：

第一，探索性。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大国，要走出一条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这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没有现成的固定模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没有成功的经验仿效，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也找不到直接的答案。然而，路总是人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1956年毅然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但是，探索者的道路从来是不平坦的。历史的足迹表明，社会主义建设的开拓者，总是清醒与迷误相伴随，成功与失败相交错。这10年间，党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国要建设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走出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有过独创性的理论贡献，

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毋庸讳言，在理论上也有不少失误。长时间以来，我们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封闭的、固定的模式，并且给它附加了许多所谓特征或判定标准，这样导致在实践中产生巨大的挫折。

第二，曲折性。恩格斯说过：“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①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出来、仅经过暂短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阶段的中国社会，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很幼嫩，要走出一条正确的建设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史，经历了顺利发展到严重挫折，又从严重挫折到顺利发展的复杂历程。而在这10年间的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呈现着错综复杂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第三，连续性。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构成历史发展辩证统一过程的不同序列，它们互相联系，不可分割。这10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它既继承和发展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伟大转变的一切胜利成果；又开拓和扩展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基业。还应当看到，在政治上，它对于认识和研究“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近因和远因有着“巨大的历史感”；在理论上，它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逻辑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让历史告诉未来”。这10年历史告诉未来一些什么呢？在我们积极而审慎地对于这10年的历史进行沉思之后，将会选择通向胜利的坦途。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象一个人成长那样，从幼年、青年到壮年，有一个发展过程。1957至1966年的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创时期。从这样的时间、空间和条件来考察和研究这10年的历史，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2页。

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①具体说来：（1）可以使人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特点和内在规律有一个科学的全面的理解；（2）能够使人们对这10年间党的工作成败得失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3）更有助于人们正确地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本书在以上三个方面所作的概述，正是力图有助于人们从历史和现实的逻辑联系上，认识中国共产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针、政策。恩格斯说：“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研究和总结10年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于探索和回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课题，必将获得许多新的启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页。

② 同上，第20卷第382页。

目 录

前 言	(1)
-----------	-------

一、回顾与评估

——概谈十年建设史	(1)
-----------------	-------

历史的回顾	(1)
-------------	-------

求实的评估	(16)
-------------	--------

二、曲折之路

——十年中的经济建设	(27)
------------------	--------

道路的探索	(27)
-------------	--------

初探的硕果	(31)
-------------	--------

“跃进”再“跃进”	(45)
-----------------	--------

重要的转变	(78)
-------------	--------

成败的借鉴	(96)
-------------	--------

三、政治风云

——十年中的政治建设	(110)
------------------	---------

崭新的理论	(110)
-------------	---------

反右再反右	(121)
-------------	---------

调查与调整	(130)
-------------	---------

再向“左”逆转	(141)
---------------	---------

民主的反思	(155)
-------------	---------

四、文坛起伏

——十年中的思想文化建设……………(161)

确定双百方针前后……………(161)

拔“白旗”、放“卫星”……………(173)

可喜的转机……………(182)

山雨欲来……………(189)

得失的启示……………(202)

五、根本和关键

——十年建设和党的领导……………(218)

求实是根本……………(219)

党风是关键……………(228)

后 记 ……………(232)

一、回顾与评估

——概谈十年建设史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一个10年史，是一部在曲折道路上创业奠基、开拓前进的历史。前人创业，后人评估，历来有之。但是，评估要恰如其分。首先，要尊重历史。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既要综观全局，又要细察其每一个局部，这样才能把握住历史发展的脉络，认识它的规律性。其次，要实事求是。既不能把事实上没有的东西强加于前人，也不应以现代的要求苛求于前人，而应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了的新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的新的东西。鉴往知来，概览10年建设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内在联系。

历史的回顾

1957—1966这10年的历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1957年，党坚持和发展了八大路线，超额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但是，“左”倾错误开始在党内出现

首先，1957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1957年是实施第1个五年计划最后的一年，也是关键性的一年。在前4年取得重大成绩的基础上，为了全面实现第1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党和政府认真执行了八大的正确方针，

在经济建设、社会改造以及体制改革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紧张而积极的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党吸取了1956年反冒进的经验，借鉴了苏联、东欧国家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人民生活的教训，坚决贯彻八大所坚持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及时调整了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确定：工业总产值603.4亿元，钢498.7万吨，煤11727万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11亿元；农业总产值621.2亿元，粮食（不包括大豆）3900亿斤，棉花3303万担；争取财政收支平衡，对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实践证明，这个年度计划既积极，又稳妥，都达到了预定要求，效果是好的。

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根据党的八大所总结的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教训，1957年，中央在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同时，认真克服和纠正正在改造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做好整顿和巩固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第一，农业合作化方面，在继续完成由初级社向高级社转变的同时，十分重视做好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着重解决民主办社，整顿组织，整顿作风，社内的生产管理，执行互利政策等问题，使合作社初步得到巩固。但是，这个整顿工作没有坚持下去。

第二，手工业合作化方面，着重解决合并过多、规模过大、人数过多、生产数量和质量有所下降的问题。1957年，采取了分社、增设服务点、改变核算关系等办法，调整现有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使大社、小社、小组等形式同时并存，集中生产与分散生产同时并存，个体手工业仍有发展。这些调整，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和产品数量、质量。但是，由于我们对手工业合作化过程中的缺点偏差纠正不力，影响了手工业的发展。

第三，公私合营企业和对原工商业者的改造方面，抓好对公私合营企业内部和对原工商业者个人的改造，是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步骤。对公私合营企业内部的改造，

我们主要抓住经营管理方式的改造，改变了资本家独揽大权和旧的、不合理的厂规、店规，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建立有职工代表，公私各方代表参加的民主管理机构，重新修订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实行计划管理，使公私合营企业生产顺利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坚持了消灭阶级，改造个人的方针，采取多种形式帮助工商界人士改造世界观。

在改革经济体制方面：从1950年初开始，党中央对我国经济体制存在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就有所察觉。毛泽东、周恩来和陈云等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对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提出了许多原则性的正确的意见。据此，国务院于1956年5月到8月间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检查了中央集权过多的问题，讨论和提出了改进体制的原则性的草案。1957年1月，党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进一步讨论了中央和地方在体制问题中的分权问题。根据会议提出的意见，1月27日，陈云在会议总结时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见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周总理去年主持的体制会议，原则上也已经把中央和地方分权的问题确定了。现在的问题是把它具体化。对待分不分权的问题，党内的意见并不完全相同，要进一步统一认识。他提出，去年讨论，今年准备，明年实行。这次会议决定分别组成工业、商业、财政、农业、交通、文教6个组研究体制问题。会后，国务院各部委，又同东北、华北、中南及四川等12个省市分批讨论修改后的草案，经过反复酝酿，初步形成了工业、商业、财政等改进管理体制的规定，提交中央全会讨论。1957年9月24日，陈云在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上的报告中着重谈了体制问题，对提交全会讨论的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作了说明。全会基本上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这三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定草案，总的精神是调整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把一部分权力下放给

地方和企业，发挥它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地制宜，完成国家统一计划。这3个规定于1957年11月经国务院第61次全体会议通过，后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84次会议原则批准，并以国务院名义正式公布，这就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

其次，国家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建设呈现出生气勃勃的局面，但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也开始出现。

为了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党在八大前后，总结了国内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国家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所以，从1956年到1957年春，我国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建设一派生机。但是，1957年春季以后，由于对国内政治形势的错误判断，导致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国家政治生活方面：在祖国大陆，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了。随着党的国家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制度必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周恩来指出：“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①党的八大明确提出：今后“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同时，还提出了继续开展反对严重妨碍国家民主生活发展的官僚主义的斗争；要从各方面加强对于国家工作的监督；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国家法制；巩固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一系列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方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4页、207页。

针。为此，八大以后，党和政府相应实行了许多正确的措施，从国家制度方面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强调人民代表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听取群众的批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展开讨论的问题，政府要作出回答；让人民代表检查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在党的建设方面，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特别强调要整官僚主义。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个方针，实际上是扩大民主。党中央的正确指导方针，使我国的国家政治生活朝着生动活泼的方向发展，在1957年整风运动初期，广大群众提出了许多正确的、积极的批评和建议。许多党组织也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努力改变作风，做好工作。当时，民主空气相当浓厚。总之，从1956年到1957年春，我们党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制度作了重大的努力，迈开了可喜的一步。

思想文化建设方面：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明确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阐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发出了“向现代化科学进军”号召，这对我国知识界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思想文化建设。在周恩来、陈毅、聂荣臻、李富春、郭沫若等主持下，全国6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初步拟定了自然科学包括技术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12年远景规划（1956—1967年）。1956年到1957年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空前活跃。

但是，在1957年5月开始进行的整风运动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当时，在一定范围内给予反击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党和毛泽东对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过分夸大了情况，加上反对右派斗争的主观主义的工作指导，使

反右派斗争出现严重扩大化，把一大批同志和朋友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长期蒙冤受屈，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这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的开始，对我国政治生活、思想文化建设乃至国民经济建设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消极影响。

再次，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独创性理论，发展了八大的正确路线，但是，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毛泽东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在八大以后，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决议》概括指出：“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他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毛泽东提出的这些理论观点，创造性地回答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从总的方面来看，1957年党在工作指导方针上坚持和发展了八大路线。但是，反右派斗争以后，偏离八大路线的“左”倾错误开始出现。表现在：第一，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损害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削弱了民族团结，影响了党群关系。第二，毛泽东在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一个根本错误的观点，而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却全部肯定了这个观点，从而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第三，提出了必须进行“一个政治路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口号，并且错误地认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革命的主要形式。第四，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

社会阶级状况的正确估计。八大二次会议完全接受了毛泽东在1958年3—4月间成都会议上提出的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错误估量。一个剥削阶级“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剥削阶级“是正在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这既否定了八大对我国阶级状况的正确估计，又推翻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论断。第五，从召开八届三中全会到八大二次会议，接连不断地对坚持八大经济建设方针和1956年经济工作中反对急躁冒进的正确决策进行了错误的批判，为“大跃进”运动的发动作好了思想准备。

值得认真思考和总结的是，为什么八大开过以后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发生这样急剧的变化呢？邓小平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①回过头来看，八大虽然提出了正确的路线，但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如何向前发展，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是不足的，虽然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意见，但不能说是成熟的，虽然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方针，但没有具体化。所以，八大没有能够防止后来“左”倾错误的不断发展，更没有能够防止“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

（二）1958年至1960年，党继续独立自主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由于在工作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严重失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从国民经济工作方面来看：从1958年开始，八大所坚持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逐步被以高速度为灵魂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所代替；八大所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建议》，逐步被“超英赶美”的口号和“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

^① 《邓小平文选》第371页。

化运动所冲掉。因此，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尽管在1958年底至1959年7月，党对已经觉察到的错误努力加以纠正，但是，并没有从指导方针上解决问题。“左”倾错误表现在：

第一，生产建设上急于求成，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盲目追求产品的数量几倍、几十倍的增长，而忽视质量；盲目追求基本建设要规模大，速度快，3年内，基本建设投资高达996亿元，比“一五”时期基建总投资550亿元还多81%；积累率剧增，1957年为24.9%，1958至1960年，分别为33.9%，43.8%，39.6%，动辄便提出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提出了五十多项这一类不切实际的口号。在“以钢为纲”的方针支配下，挤了农业和轻工业，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要束紧腰带过日子，出现了极端困难的局面。

第二，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超越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农村，盲目追求“一大二公”，高级社还未站稳脚根，就匆忙地合并、升级为人民公社，未经试验，便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在城市，取消了个体手工业和小商贩，把许多手工业合作社、合作商店合并或升级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同时，不适当地推广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并一度错误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取消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还脱离实际地在人民公社内部“实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等等。

这3年中，由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生产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建成了一批重要的工程项目。据统计，1949年至1964年所建大中型企业中，1958—1960年开工的占1/3左右。我国重工业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生产能力，比1957年有很大的甚至成倍的增长，这些新增长的生产能力后来经过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我国新建了石油化工设备制造，拖拉机制造，精密机械制造，有机合成等重要工业部门，发现并开发

了大庆油田。这些成果是应该肯定的。

从国家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建设来看：50年代末期，八大正确路线逐步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方针所取代；国家政治生活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逐步以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中心。紧接着反右派斗争之后，又把全国范围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发展成为所谓“插红旗、拔白旗”运动。这就是要插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拔掉所谓“资产阶级白旗”。实际上，是把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反对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的同志视为“右倾保守思想”的反面人物，错误地当作“白旗”拔掉；同时，又把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同志也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去拔，加以过火的批判、斗争甚至处分。这个运动，实际上是用行政手段和群众运动的方法去对待学术分歧和思想问题，对待改造主观世界的问题。在文化知识界和工农商各条战线的实践中，效果是很不好的。它事实上是直接为发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路。换句话说，就是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建设社会主义。“左”倾理论不仅渗透到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日益支配了党内生活。1959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同志的错误批判以及随之而来在全党范围内错误地开展“反右倾”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政治上发展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左”倾错误；思想上滋长了形而上学和主观唯心主义；组织上损害了民主集中制，助长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总之，使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群众的民主生活以及思想文化建设受到极大的挫折。

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来看：1958年到1960年党的工作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集中反映了党和毛泽东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基本问题上的理论方面出现了错误。例如：

第一，斯大林在1936年和1938年的苏联宪法报告和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曾提出建成社会主义两个标志：一是消灭